

重新学习 继续革命

辽宁省“五·七”战士批修整风讲用会材料选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重新学习 继续革命

辽宁省“五·七”战士批修整风讲用会材料选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沈阳

目 录

培养造就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必要之路

..... 《辽宁日报》社论 (1)

培养造就干部的重要途径

..... 中共凤城县杨木公社委员会 (4)

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

..... 中共新民县委员会副书记 张翰卿 (14)

能上能下 能“官”能民

..... 昌图县化肥厂革委会主任 王遵之 (22)

立志建设新农村

..... 中共清原县大孤家公社委员会书记 聂忠学 (27)

扎根山区干革命

..... 中共盘县太平庄公社委员会书记 何德礼 (34)

志在牧区创新业

..... 中共翁牛特旗白音套海公社委员会书记 刘镜菲 (40)

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锻炼成长

..... 盘锦地区盘山区医院内科主任、党支部书记 于立娟 (48)

永远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 盘锦地区革委会宣传队创作组 胡景芳 (55)

培养造就无产阶级 干部队伍的必要之路

《辽宁日报》社论

省“五·七”战士批修整风讲用会，用先进典型的生动事迹和切身体会，有力地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全省广大干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干校去，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充实基层，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大课堂里，重新学习，经风雨，见世面，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的实践经验雄辩地证明：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一条必由之路。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我们的干部，必须扎根于群众之中，在群众斗争的风雨中成长。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是彻底的群众路线，而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正是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阶级本色。在为人民的事业中，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是我们党的干部的光荣传统。许多老党员，老干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用党的路线和政策，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带领群众同敌人作拼死的斗争。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才造就出今天这样一支宏大的干部队伍。

正确的路线，绝不是平安产生的，而是在同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发展的。政治路线是这样，同政治路线相适应的干部路线也是这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抛出“入党做官论”，来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干部队伍。那些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也把复辟的梦想，寄托在干部队伍的和平演变上。列宁的故乡，已被苏修叛徒集团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面对国际国内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怎样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呢？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象灿烂的朝阳，照亮了我们继续革命的航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斗争，在革命大批判中，广大干部更加认清了刘少奇那套“闭门修养”、“入党做官”的反动本质，坚定地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参加劳动，重新学习。在这条革命道路上，那些经受过长期革命锻炼的老干部，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打掉“官气”，洗刷唯心精神，焕发了革命青春，和人民群众的心贴得更紧了，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为人民立下新功；新干部在这条光辉的道路上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老一代革命者的光荣传统，在他们身上发扬光大。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的胜利，是对资产阶级的严重打击。刘少奇一类骗子跳出来，恶毒攻击和咒骂干部下放劳动是什么“变相失业”，妄图煽动下放干部对党不满，离间广大干部同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阶级敌人的无耻攻击，激起了广大下放干部的无比义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变相失业”的叫

骂，不过是刘少奇那套“入党做官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而已。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看来，干部到群众中去，到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去，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创社会主义革命大业，倒叫“失业”；而把干部关在小屋子里搞什么“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搞资产阶级政治，脱离劳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这才叫“有业”。这同“入党做官论”的罪恶用心是同出一辙的，其目的全在于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这样起劲地叫骂攻击，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只不过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恐惧和绝望的哀鸣。“让他们去狂吠吧！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三二页）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走“五·七”道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大事，这是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场大革命，它势必震动着整个社会，触及着人们的灵魂。这场大革命反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就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和斗争。世界观的改造确实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过程，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才能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所以，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还是要坚持实践，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逐渐地把我们的立足点移过来，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实行彻底决裂。这样，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就能明辨阶级敌人的谣言和诡辩，看清问题的本质，把握运动的主流和方向。方向是明确的，道路是广阔的，让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坚信不疑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道路，高举红旗，奋勇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辽宁日报》）

培养造就干部的重要途径

中共凤城县杨木公社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底到一九七〇年初，先后从省、市、县分配了九十五名“五·七”战士，到我们公社插队落户。当时，可把我们乐坏了，大家高兴地说：“老八路又回来了，一定会把咱们杨木公社变得更好。”一九七一年九月，插队落户干部充实基层以来，又有二十六名同志先后充实到我们公社工作。其中，有两名同志担任了公社党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七名同志分配到公社机关，八名同志担任了学校教员，四名同志到公社医院做医务工作，五名同志到供销社担任领导和其他工作。三年来，经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这些同志不仅在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而且对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在，我们公社的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一九七二年的农业生产，战胜了严重旱灾，又获得了大丰收。全社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九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林、牧、副、渔生产也有了发展。讲起这些喜人的变化，人们都说，这同干部插队落户、充实基层分不开呀！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金日衡同志是原中共丹东市委的干部。三年前，他带领

全家来到杨木公社插队落户。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他珍视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在生产队积极劳动，当好参谋，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受到社员群众的称赞。前不久，县委为了充实杨木公社的领导力量，决定派金日衡同志担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下放两年多的战斗生活，使金日衡同志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发生了深厚的感情，他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党和贫下中农的期望，艰苦奋战三五年，誓教杨木山河变！

他从县里接受了工作任务，心情很激动，恨不能一步返回杨木，投入改天换地的战斗。下了汽车，老金迈着急促的步伐，跨进了公社党委办公室，兴冲冲地说：“我报到了！”正在研究工作的几名党委成员都有点出乎意料。大家都知道老金的家正好在县城通往公社的路上，估计他可能到家安排一下家务再来上班，谁知老金却路过家门而不入！当大家问起这事时，老金爽朗地笑着说：“公社就是我的家，和大家一起建设新杨木是我最重要的战斗任务！”

第二天一早，老金就到前进大队同社员一起投入了春耕生产的战斗。

前进大队原来是全社的“粮囤子”，金日衡同志到这个公社不久，就发现这个“粮囤子”打粮并不太多。究竟什么原因？他深入群众进行调查。了解到有一部分水田产量低，主要是种子混杂。有人主张把水田改成旱田，老金说：“这里的土质和水源条件都适合种水田，低产的原因主要还是种子问题，应当设法改良种子，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第二天，老金和一名社员夹着麻袋到丹东郊区蛤蟆塘公

社串换稻种去了。稻种换妥了，怎样把七八十斤稻种运回去呢？乘车，就得花几元钱，而且当天赶不上回杨木的汽车。经过两年多的下放劳动，老金深切体会到节约生产开支，减轻社员负担，对于巩固集体经济是多么重要。为了使集体少花钱，他和那位社员把稻种往背上一搁，抄着山区小道往回赶。天渐渐黑了下来，他俩一连走了五十多里山路，翻过了两座大山，到队里时，汗水浸透了衣服，两脚打满了血泡。见此情景，群众感动地说：“老金为咱贫下中农花费了多少血汗呐！”

育苗时，老金带头跳到带冰碴的水里和贫下中农一起修床撒种；追肥时，劳力紧张，老金衣服一甩，领头往地里撒化肥。为了加强田间管理，老金起早贪黑，站在稻田埂上看水。秋天，稻田里滚动着金色的波浪，水稻获得了好收成，单产翻了一番。这一年，这个队的生猪也发展起来了，大队还办上了农电，实现了碾米、铡草、粉碎机械化。

在胜利面前，金日衡同志更是重担抢在肩，艰苦走在前。群众满口称赞地说：“经过插队锻炼的干部，路线觉悟高，和群众心连心，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

在群众中生根开花

赵维同志原来是丹东市农业局的一名农业技术干部。他在一九六九年冬插队落户之前，曾搞过良种试验。这次到农村，他决心通过生产实践，让优良品种在农业增产中发挥作用。他把自己保存的一些“贫农乐”玉米良种带到了杨木。赵维到了生产队，正赶上打场，他发现这里由于种子严重退

化，影响了产量。他找队干部商量，建议成立个“三结合”科学种田试验小组，并且把自己带下来的“贫农乐”亲自背到了生产队。当时，赵维心里也犯核计，怕搞不好，浪费人力、物力，老贫农张大爷看出了赵维的心思，就鼓励说：

“干，有俺们支持，还怕不成功！”

一九七〇年春天，赵维和试验小组的同志们及时播下了种子。可是小苗出土后，又黄又瘦，比本地品种差一色。什么原因呢？赵维首先翻书本，但没找到答案。后来，他和老贫农跑到地里，扒开土来看。张大爷告诉他，这是沙石地，土沉，埋厚了，小苗不爱长。他们便采取了补救措施，加强了田间管理。赵维和张大爷住在一个小窝棚里，整天守在种子田。苞米快出薹时，早晨下地，露水湿得全身水漉漉的；中午钻进苞米地，太阳晒，叶子拉，他全不顾。经过辛勤培育，秋后种子田的玉米每亩打八百多斤，豆子打四百多斤，贫下中农喜得不得了。

赵维培育良种的事象一阵风似地传开了，不少邻队的干部都来请赵维帮助他们培育良种。这时，赵维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前，在市里工作的时候，总以为自己上过农业大学，凭一点书本知识，也能在农业科学领域攻克尖端、创造奇迹。有一次下乡搞玉米大垄双株试验，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失败了。群众说：“大垄双株，一个有棒，一个光秃。”当时，他心里很不服气，觉得群众不懂科学。这次，他才深深地感到，一个知识分子，只有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增长才干，发挥作用。

经过一段劳动锻炼，组织上把赵维安排在公社作农业助

理。他向党组织表示：要做一颗革命的良好种子，党把自己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

赵维当了公社干部以后，时刻牢记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教导，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之中，虚心学习群众的增产经验，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一天傍晚，他路过前进一队，走进看场院的窝棚里，向老贫农董维金请教农业增产措施。一讲种庄稼的事，董大爷打开了话匣子，说：“要论种地可有不少说道，就讲种子吧，俗语说：‘良种下田，必有丰年’；种啥茬口也有讲究，‘种地要巧，三年一倒’，再就是下粪，‘扬粪一大片，不如一条线’，粪力集中，产量必增。”董大爷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使赵维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三星偏西了。第二天清晨，赵维走出小窝棚又穿东沟，进西岔，田间访，炕头唠，孜孜不倦地向群众学习。现在，在赵维随身携带的几个小本子里，已经记下了一千多条农谚。他对搜集到的每条农谚都用心研究它的科学道理，并用到指导农业生产上去。今年十月的一天，社员们正在场院选玉米种，突然西北上空乌云滚动，赵维想起老农郭忠祥说的农谚：黑云上面有白云，上下翻动冰雹临。眼前的情景正是要下冰雹的样子。赵维立即组织社员，发射土火箭，打散了云层，冰雹化成了雨，避免了苞米种受损失。大家都说赵维有本事，他回答说：“这都是群众的智慧，离开群众，一事无成。”

两年来，赵维在“五·七”道路上就是以这种崭新的姿态工作和生活的。他跑遍了全公社所有的生产队，培训了四十多名农业技术骨干，和二十多个生产队的科学试验小组同

志一起种了一百多亩试验田，普遍获得了高产。

进行长期痛苦的磨练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公社一些“五·七”战士充实基层以后，并没把它看作是思想改造的终点，而是作为继续革命的新起点，更加自觉地进行长期磨练。

充实在杨木中学的张家珠同志，原是丹东市第二中学高三班的数学教师。文化大革命前，为了使她多考上些有名气的大学，她起早贪黑地忙，认为这样就能达到学生、家长、领导“三满意”，也就算尽到了自己当教师的责任了。

来到农村以后，火热的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使她的思想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深深地感到自己过去是不看方向，不问路线，稀里糊涂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卖力。她决心抓紧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努力改造世界观，把后半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有一次，张家珠到一户社员家去走访，老贫农把她拉到炕头上，亲热地说：“俺队三十多户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没有一个能念得起书的，找个会计都不容易。如今可好了，在毛主席领导下，孩子们都能上学念书。你们当老师的对学生要敢管敢教，队里可需要有文化的人哪！”一席语重心长的话，使张家珠很受触动。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尽快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是关系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为了教好数学课，张家珠就和数学组的其他教师根据学生掌握数学基础知识的不同程度，分科目进行

摸底，然后分别给学生补课。贺永安是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孩子，他认为迟早也得下庄稼地，学不学数学没啥用。张家珠知道这孩子是受了“读书无用论”的毒害，就多次热情地找他谈心，说明当农民同样需要文化科学知识，耐心地对 him 进行辅导。现在，贺永安变样了，每天主动交作业，不会的问题非弄懂不可，学习成绩提高很快。

张家珠同志教数学课已经有十五年的历史了，对自己任课的教案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她常说：我们是人民教师，不是旧社会的“教书匠”。形势在不断变化，学生接受能力各有不同，教案也要经常研究，常讲常新。每天晚上她忙完家务，孩子们都睡下了，她戴着深度的近视镜，在油灯下专心致志地准备着第二天要讲的课程。老师和同学们都夸张老师讲课耐心、清楚、透彻，敬佩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贵品质。

张家珠的家离学校有十多里路，她坚持每天步行往返，顶晨星出，背夜月归。不管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风雪交加的寒冬，从没误过一次课。她说：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象学生上课一样，不能缺课，要坚持到底。一九七一年冬天，一场大雪封门，插下一脚，雪没过膝盖。孩子说：“妈，这么大的雪，连路都找不到，您就别去了！”她坚定地说：“贫下中农的子女在等着我上课，下刀子也得去。”公社领导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处房子，让她搬过来，她却主动让给新调来的一位教师。她说：“我已经锻炼出来了，那位同志比我困难大，让她去住吧。”就这样，她两年如一日，狂风挡不了，暴雨拦不住，徒步行走了一万四

千多里。

胸怀壮志绘宏图

充实到我们公社的插队干部，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扎根山区干革命，胸怀壮志绘宏图！

一九七一年十月，于厚轩同志被分配到供销社当革委会主任。消息传开，有人说，象老于这样的老党员、老干部当个供销社的主任，是不是大材小用了？老于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

过去我们公社供销社的经营方向不够明确，在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贫下中农有些意见。于厚轩同志来到供销社以后，就和职工一起讨论如何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我们公社盛产木耳，这几年由于抓的不够，没有发展。他就和党支部其他成员一起，深入生产队，向社员宣传发展木耳的重要意义，同时注意落实收购政策，一些木耳资源丰富的生产队，新建起了木耳园，使木耳生产又有了新的发展。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老于到外地参观回到公社，他没有立即向党委汇报外地的经验，先掏出一个大苹果，切了几块分给大家尝尝。老于说：“这是我从宽甸县一个果园带回来的。人家那里土质、气候和咱这里差不多，为什么宽甸县可以出苹果，我们就不行呢？”公社党委的同志听了老于的一番话，受到了启发，对杨木发展果树充满了信心。一九七二年一开春，全公社掀起了栽植果树的高潮，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就栽了一千多棵苹果树。这年夏季，他又为各大队发展药园而奔忙。老于拄着棍子，顶着烈日和大队干部一起，翻山越岭，选药材点。有时，走路多了，他的肺气肿病又犯了，就停下来喘喘气、吃点药，又继续前进。贫下中农看他一个心眼扑在革命事业上，不分昼夜为建设杨木奔波操劳，都担心他把身体累坏了。老于激动地说：“现在我重新回到了群众中，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于厚轩同志是一个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党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他是丹东市海关的关长。过去，由于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思想感情起了变化，逐渐脱离群众。有一次，为了讲阔气，图舒服，光修饰一下关长办公室就花了一万多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革命群众的帮助教育下，特别是经过走“五·七”道路的锻炼，老于又重新回到群众中来，和群众心连在一起，想在一块了。有一次，他看到有的社员把过水的碎鸡毛白白扔掉，心想：这种鸡毛可以作工业原料，我们供销社如果开展这项收购业务，社员卖一两鸡毛就收入二分五厘钱，就能换回一盒火柴，同时也能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做一点贡献。在他的提议下，供销社很快增加收购鸡毛的业务。还有一次，发现有的社员不愿在当地供销社买花布，跑到二十多里路到东沟县去买。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仔细打听，原来东沟县直接从丹东市进货，路途近，运费少，货物全，价格低。他想，如果从杨木到东沟县的红石公社修一条公路，直通丹东，就可直接进货，可减少货物运输里程和周转费用，社员

每买一尺布就可少花一分钱。杨木到丹东的这条公路，已经得到上级批准修建，不久即将动工。在日常生活中，一两分钱是个比较微小的数字，但是，象于厚轩这样一个老同志能从这一两分钱上看到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想到自己的责任，那是思想感情上的多么大的变化啊！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干部插队落户和充实基层，是培养造就干部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是干部实现思想革命化的需要，而且是加强农村建设的重要措施。我们公社插队落户和充实基层干部锻炼成长的事实，就是对刘少奇一类骗子诬蔑干部下放劳动是“变相失业”的谬论的有力批判。

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

中共新民县委员会副书记 张翰卿

我是原沈阳市供销社主任。一九七〇年一月，遵照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指示，从沈阳市到绥中县西平公社西平大队插队落户。一九七二年四月组织上调我到新民县委工作。三年来，在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指引下，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重新学习，受到了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焕发了继续革命的朝气。

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思想

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是一场由“官”到民的深刻的政治思想革命。对于这场革命，我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认识到逐步认识，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的。刚插队时，总觉得自己是农民出身，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农村，艰苦的生活，战争的环境都经历过，进城后，又经常往农村跑，到农村插队落户，对我来说，不大必要。

到农村以后，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象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思想上沾染的资产阶级的灰尘，暴露了我身上受修正主义干部路线毒害的烙印。比如，在城里住惯了暖气楼房，重新回到农村住上茅屋土炕，我感到过不惯；蹲惯了机关大楼，重新回到劳动中，面对着“扁担上肩，一身透汗，拿起铁镐，